

研經與書藝

錢大昕、翁方綱展品選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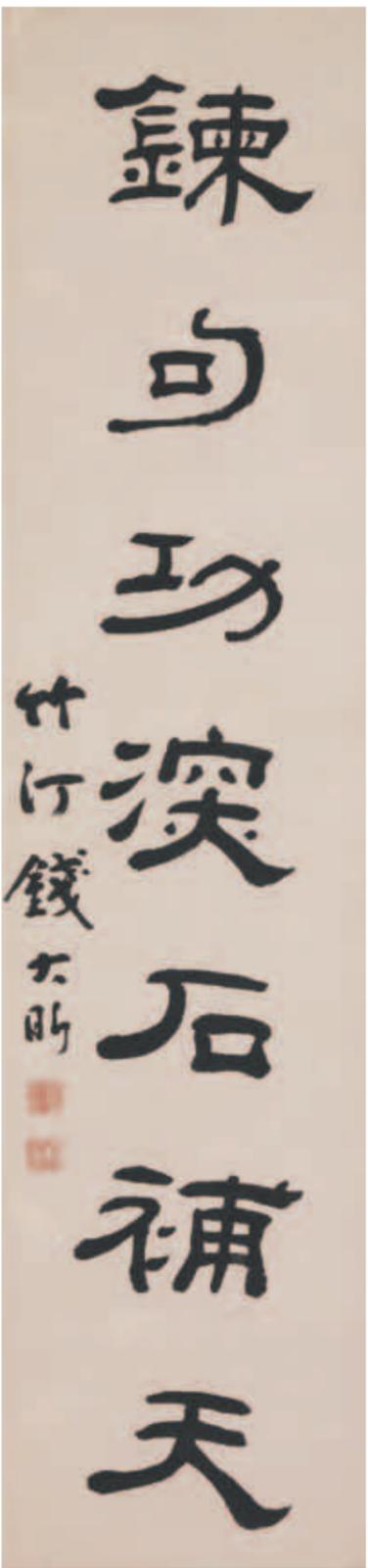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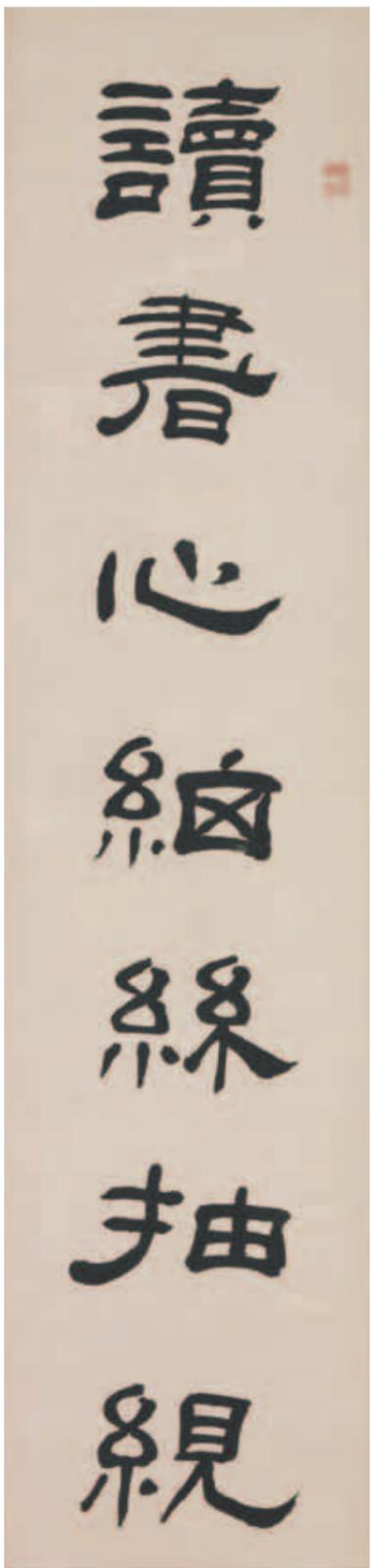
王競雄

清人學術研究當推經學為主流，沉潛在儒家經典中的學人，數量之眾為歷代之冠，其中一部分基於個人志趣，多數則抱持經世濟民的襟懷，期能淬取經書思想的精華，而後有益於國計民生。多年來學界對清人學術的探討已從各方面深入，經學家深厚的學養、多方面的造詣令人讚歎不已，部分經學家不僅研經有成，且在書藝領域中耕耘，出入傳統，煥發出新的光輝。本院此次推出「研經與書藝」展覽，即得助於學界的研究成果，循著經學家行進的點線面，參驗院藏清人書法作品，串聯成展覽的主軸。從篆隸到楷行草書，合計展示十六位經學家的書法，數量雖然不多，卻件件內涵雋永，具現學養、書藝相與潤澤的成果。本文從書法的視點出發，就學養潤及書法的部分，略舉錢大昕、翁方綱作品選介實例來呼應展覽主題，一鱗半爪，實不足以得其萬一。

清人有云：「今之竹汀，猶古之鄭康成也」，其意在推許錢竹汀（一七二八—一八〇四）的成就，可以比美東漢經學大家鄭玄，錢竹汀即為錢大昕。對於錢氏運用金石史

料證經考史的成就，清人王鳴盛也進一步加以評可，許為「古今金石學之冠」。錢氏的學術造詣有文集《潛研堂全書》可以見其廣博，深厚的學養也從書法中自然透露出來，本次展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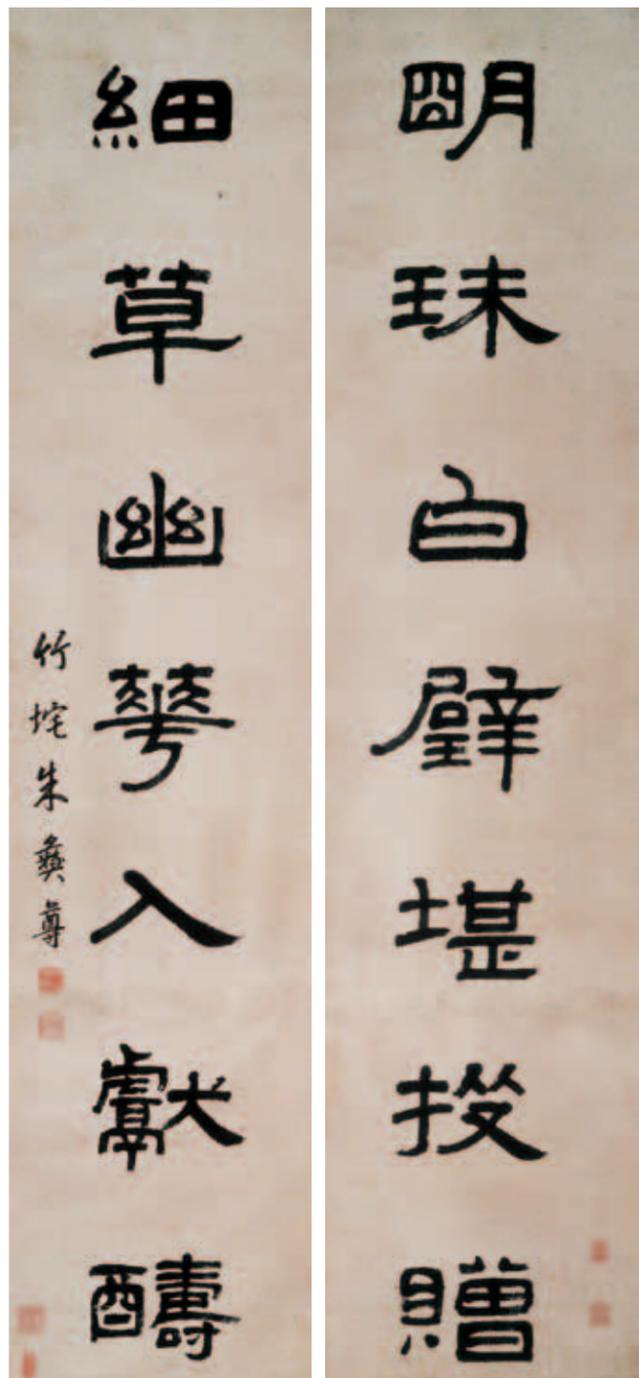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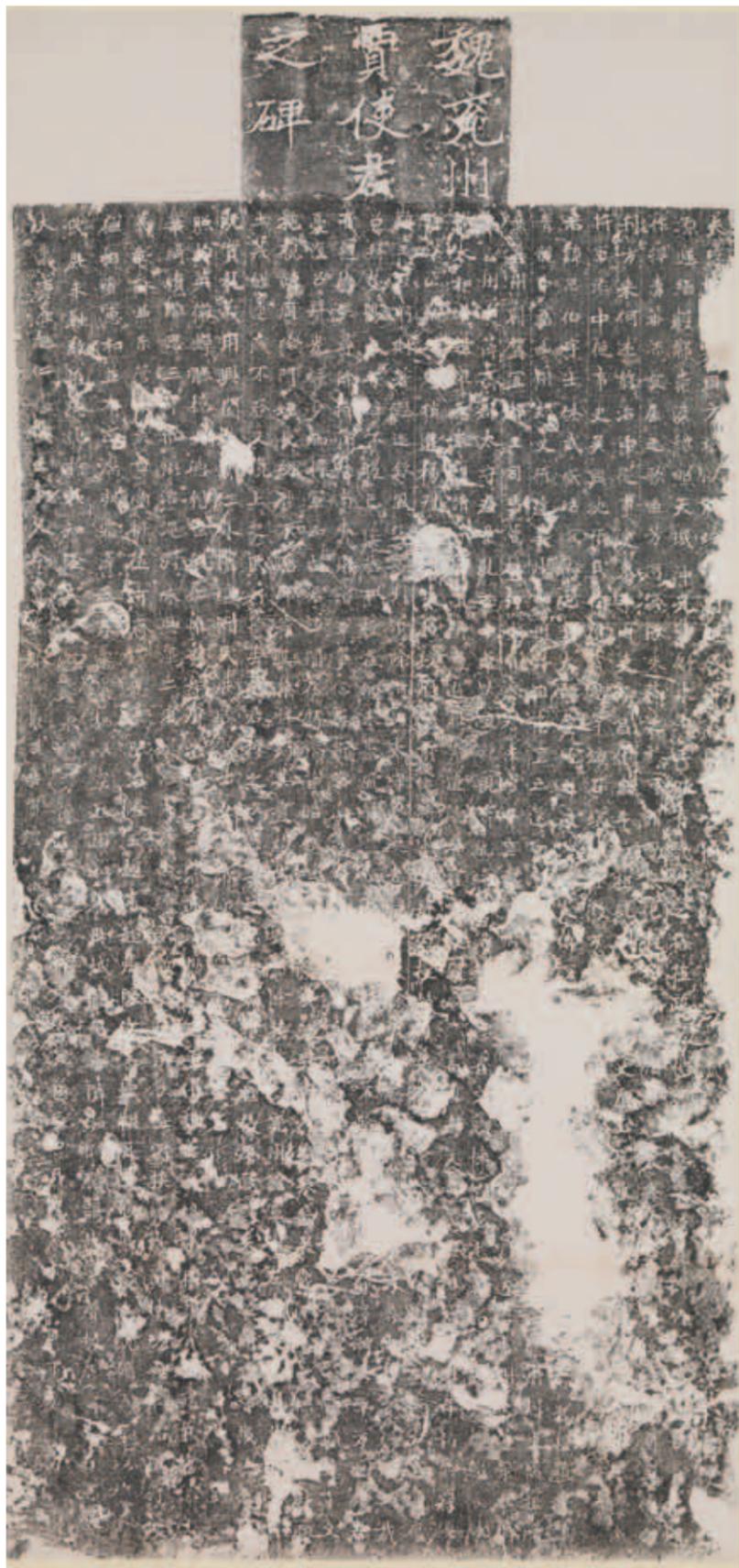
的〈隸書七言聯〉：「讀書心細絲抽視，鍊句功深石補天」，足見錢氏落筆推求本源，留心隸變的來龍去脈，對於漢碑的取擇有其方寸。（圖一）例如上聯「**絲**」字，漢碑寫法不一，



圖一 清 錢大昕 隸書七言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北魏 賈使君碑陽及碑側墨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清 朱彝尊 隸書七言聯 蘭千山館寄存

或為「**𠄎**」、或作「**𠄎**」，前者偏旁猶見承篆寫「**𠄎**」蜕化的痕跡，如〈魯峻碑〉即然；後者偏旁訛變，遂與「**田**」字混同，見於〈張遷碑〉。「**𠄎**」、「**𠄎**」均通行已久，清人隸書中也見兩種寫法並存，若以清初朱彝尊〈隸書七言聯〉：「明珠白壁堪投贈，細草幽華入獻壽」為例，與錢

氏此作比較下，顯示各有取擇，而知錢氏留心處。（圖二）類此講求篆隸遞變的淵源，也見於「書」字、「深」字，兩字隸變後寫法均已多樣化，錢氏取擇「**書**」、「**深**」，留心到「者」、「火」，與篆寫「書」、「**灑**」之間的關聯；至於「**𠄎**」（**爾**）字，古文寫法為「**𠄎**」，見收

於《說文》，錢氏隸寫作「**𠄎**」，其由來可以瞭然。
從隸書審美的觀點來看，錢氏結字有得於東漢〈禮器碑〉的規律，留心左右偏旁位置高低錯落的安排，視筆畫的繁簡加以調整，以免平行對稱流於刻版的弊病。例如「**鍊**」、「**𠄎**」，偏旁位置上下錯落，點畫呼應的

研經與書藝

清代經學家書法展

經學家泛指研究儒家經書成就可觀的學人，這些學人研究的主要目標，在於汲取經書思想的精華，因應活用，期能有益於國計民生。經學的範疇雖然以儒家重要經典四書五經為主軸，在歷代學人相繼耕耘拓展下，到了清代，治經的方法日臻嚴密，旁徵博引往往涉及其他相關學門，諸如史學、語言文字學、金石地理等，彼此相輔相成，形成一個紮實的研究體系。清代經學家沉潛其中，說解、考證經文，貫通義理，闡揚、批判兼而有之，讓人體認到學者熱衷於經世濟民的精神。

清代經學家研經有成，同時以翰墨見長者不乏其人，本次展覽就院藏部分選列十六位，已然可見傳統書法煥發出新的光輝。清人上承宋元明書學傳統，根基深厚不待贅言，又適逢古文物陸續出土，有幸見前人所未見，允為書學真實可貴的素材。本著研究經學實事求是的一貫態度，經學家詮解篆古文字形音義，考知隸變的由來，運筆作書遂見學有本源，革除前人臆造褊狹的弊病。如此學養與書藝相互潤澤，經學家或許無意引領書壇，卻產生十足的動力，開啓清代篆隸書法新局面。

從審美的角度來看，經學家書藝取向儒家崇尚中和，筆端不激不厲，無意於情感過度奔馳和釋放，學養積中，而後英華自現。誠如《孟子·盡心篇》所言：「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」，清代經學家書法沒有炫目的個性表現，作品內涵卻令人探索不盡。

萬學都為索詩開

世園俞樾

片石常因醒酒踞

華南七九屬

情態，頗有無意於佳乃佳的意趣。清人隸書取法的方向，多數以漢碑為宗，錢氏體認〈禮器碑〉，著重在點畫俯仰波動中見精神，此幅書聯結體重心微落右下方，燕尾出鋒之際散發靈動的氣息。在錢氏《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》中，記所藏拓本多至兩千餘件，這些珍藏足為臨池學書的參考資料，轉益多師，落筆可無褊狹的遺憾。據陳東輝先生〈清代私家藏書與學術發展之互動關係〉一文統計，錢氏作學問，「曾多次向黃丕烈、袁廷禱、盧文弨、周錫瓚、顧之逵、戈甫襄、嚴元照、何元錫、劉桐、吳騫等人借抄圖書」，來彌補個人藏書不足，其學力淵博誠非易事。循此推敲，錢氏抄書練就的筆力，裨益書法之處也就不待多言。

翁方綱（一七三三—一八一八）

《復初齋文集》收存〈跋董文敏論書帖〉一段文字，文中於評論董其昌書法之後，提出如下見解：

士生今日，則經學日益昌明，士皆

知考證詰訓，不為空言所泥。於此精言書道，則必當上窮篆隸，闡釋晉唐以來諸家體格家數，不得以虛言神理而忘結構之規，不得以高談神旨而忽臨摹之矩。且楷承隸變，自自由方整以定其程，不得輕言圓美，以開平易之漸。此則實關於士君子持躬涉世之正，所裨非細，豈徒為書道計哉。

翁氏的觀點反映彼時部分學人的趨向，著重務實，上古下今力學不輟，從臨池學書到為人處世，均以嚴謹的態度從事。本次展出翁氏一則題記，見於北魏〈賈思伯碑〉碑側（圖三），楷法工整，有得於歐陽詢〈化度寺碑〉。據沈津《翁方綱年譜》記載，乾隆五十六年翁氏提督山東學政，到任後按試兗州，得有機緣親見〈賈思伯碑〉。

〈賈思伯碑〉初立於北魏神龜二年（五一九），碑額云：「魏兗州賈使君之碑」，因此也稱為〈賈使君碑〉，清人王昶《金石萃編》

加以著錄時，碑石尚在山東兗州府學，一九五一年後移入曲阜孔廟保存。〈賈思伯碑〉的生命力相當堅韌，流傳歷程中兩度湮沒，北宋紹聖年間重出，其後元至正年間再次出土，詳情均見於碑陰記載。其初碑石安置戶外，飽經風雨剝蝕，字痕漫漶日甚，康熙五十九年兗州知府金一鳳將其遷移室內保存，並於碑側記其始末：

此碑自三國時至今幾二千年，真神物也。興廢之由，詳於碑陰。金石錄中云，使君碑在兗州，自立風日中，字多剝落。今置之廡下以護之，庶後之好古君子得以永久觀覽云。康熙庚子之夏，卓異兗州府知府山陰金一鳳識。

翁氏發現金一鳳誤以三國為立碑時代，因於碑側附記：「是碑魏神龜二年四月立，非三國之魏也。」其更正確立碑的時代，適可為經學家實事求是的態度作一註解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展期：2012 / 04 / 01 ~ 2012 / 06 / 25
陳列室：204, 206